

【中东研究】

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

王铁铮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中阿交往的源头可上溯至古丝绸之路, 民间交往和官方交往互为促进, 唐宋时代达到鼎盛, 明末趋于萎缩。中阿交往涉及多种领域, 既有以物质和精神活动为内容的和平交往, 又有以战争和冲突为蕴含的暴力碰撞。所有这些交往都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推动着彼此的科技与文化发展, 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非凡贡献。

关键词: 中国; 阿拉伯国家; 历史; 文明交往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4)03-0115-05

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文明交往, 不同的文明则仰赖相互间的交流和融汇而使自身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因此, 文明交往又是繁荣科学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和动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中阿关系源远流长, 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绵延不绝的接触与交流, 在世界历史上谱写了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往的光辉篇章。

一、“丝绸之路”与“香料之道”

早在 2000 年前, 中国与阿拉伯人已开始了彼此的往来。中国最早记载有关阿拉伯的史书有《汉书》、《魏略》、《史记》和《通典》等, 阿拉伯最早记载有关中国的古文献是埃及人托雷美(Torremei)于公元前 150 年撰写的《地理书》。远在西汉时期, 张骞奉命先后于公元前 139 年和公元前 119 年两次出使西域, 陆续开辟了中国通往中亚和西亚的古商道, 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它从我国古都长安起, 西去经天山南北, 由喀什穿越今天的阿富汗、伊

朗, 抵达阿拉伯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张骞“凿空西域”意义重大, 它揭开了汉王朝同西域(包括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新阶段。当时的许多中国、波斯、阿拉伯商贾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进行贸易交往的。

东汉时期, 当东汉新政权结束自西汉末年以来的政局动荡, 巩固统治后, 班超在明帝执政年间受遣再度出使西域, 重新打通西域通道, 并于公元 97 年(和帝永元九年)派副使甘英从陆路经中亚到西亚各国访问, 甘英曾远行至条支(汉朝称阿拉伯国为“条支”)。《后汉书》记载说:“和帝永元九年, 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 抵条支。”^[1](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甘英之行既是古代中国政府使者远行阿拉伯的最早记录, 也是中阿正式交往的开端。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阿之间的相互了解, 特别是甘英的西行获得了许多前人所不知的有关阿拉伯的信息, 同时也为中阿之间的海路交往提供了依据。《后汉书》中可以找到由阿拉伯半岛抵达红海航线的记载:“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 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 至斯

收稿日期: 2003-10-16

作者简介: 王铁铮(1950), 男, 陕西西安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东历史和当代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行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¹ 公元5世纪，伴随航海业的发展，中国的远洋帆船已航行到波斯湾头。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马斯乌迪(Al-Mas'udi)在其著作《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中说：公元5世纪前半期(相当于我国南北朝宋代)，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下，就时常有中国商船远航至此，同云集此地的各国商人进行贸易。公元6世纪时，中国的商船经常访问波斯湾，可以直航阿曼、西拉甫、巴林、奥波拉、巴士拉等地，而上述各港的船只，也可以直航中国²。阿拉伯商船的航程通常是从波斯湾出发，经阿拉伯海到达印度，并从印度的马尔巴拉海岸，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穿过南中国海，抵达广州。由于当时的阿拉伯商船沿上述航线同中国的贸易交往多以阿拉伯盛产的各种香料为主，因此，这条海上贸易通道被称为“香料之道”。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道”的开通为汉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同阿拉伯各地更频繁更广泛的交往铺平了道路。

二、唐代的中阿交往

唐王朝建立后，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与此同时，在亚洲另一端有威震四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强国，中阿之间的交往，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

在中国的古籍和文献中，唐朝称阿拉伯国为“大食”。据《旧唐书》卷四记：“永徽二年八月乙丑，大食国遣唐使朝献。”唐高宗永徽二年是公元651年，相当于伊斯兰教历31年。中国史学界普遍认同这一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另据德宗贞元年间著名地理学家、宰相贾耽在他的《古今群国县道四夷述》一书中的记载，唐朝同大食国的交通，有两条路线：其一是出安西，经中亚的陆路交通干线；其二是出广州，沿海岸而行，经太平洋、印度洋至波斯湾头的奥波拉和巴士拉，再由两河口上溯至巴格达的海路交通干线。自永徽二年后，阿拉伯来华使节络绎不绝。从公元651年至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达39次(亦有36和37次之说)之多。阿拉伯

遣唐使的陆续来华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

中阿官方频繁的交往直接推动着中阿民间各种经贸活动的发展。由陆路和海路抵达中国的阿拉伯商人与日俱增，这些商人主要聚居在诸如长安、洛阳以及广州、扬州、泉州等沿海大城市中。唐代来华的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在公元851年所著的《苏莱曼东游记》中记述，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其他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一度曾高达十余万人^④。阿拉伯商人来华从事贸易经营的主要商品包括：象牙、犀角、乳香、龙涎、宝石、珊瑚、明珠、琉璃、丁香、没药、苏合香等，他们从中国采购的商品则以蚕丝、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铁器皿等为大宗。与此同时，中国也组织商船远航到波斯湾和红海一带。

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早在公元714年就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海外贸易的专职机构——市舶司，并明令保护外商和鼓励外商来华贸易^④。阿拉伯和其他外国商人云集的广州、泉州和扬州日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随着贸易量的迅速增长和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大，许多在华的阿拉伯商人已经相当富有，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因富有而获得唐廷较高的官位，还有一些人考取了科第，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考取进士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形成和出现了若干“蕃坊”(城市中外人居住的街区)。为便于对“蕃坊”的治理，唐廷在蕃人中挑选德高望重者为蕃长，并由皇帝任命。蕃长按照穆斯林的习俗和律条进行管理，负责司法裁决和安全工作，同时还负有协助唐廷征收税款的职责。当时阿拉伯穆斯林上缴的税款在唐廷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此外，蕃坊内还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如允许建立礼拜寺，进行宗教活动。阿拉伯穆斯林在各自的聚居区内修建清真寺院，履行宗教功课等。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大都留存在中国大商业城市中的原因。

战争也是中阿历史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交往价值不是表现在彼此间军事上的胜与否，而是反映在超越军事胜负的潜层意义上，即战争后果所引发的文明互动的连锁反应上。据中国方面的史料，

¹ 《后汉书》第一一八卷：《西域传》。引文中的阿蛮即阿曼；斯宾即波斯古都克泰西封；于罗即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古城；度河即渡底格里斯河，克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于罗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大秦即罗马帝国，当时的埃及隶属于罗马帝国。

^④ 苏莱曼：《苏莱曼东游记》，刘半衣，刘小惠译，中华书局出版。

^④ 《全唐文》第七十五卷：唐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三、宋元明时期的中阿交往

据史书记载,在宋王朝存在的300多年间,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正式交往约有40余次^[5]。但由于当时中国西北陆路交通不畅,中阿的交往主要取道海路进行。那时候,中国的航海和造船业已相当发达,船大且坚,并配有桅、帆、橹、舵等,不仅航速高,载重量大,而且安全性能也比较好。同时,中国远洋商船还开辟了一条新的“香料之道”航线,即从广州(或泉州)出发,横越印度洋,不经印度,从苏门答腊直达阿曼佐法尔地区。这条航线路程近,并可借助印度洋上的季风,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这就为中阿的往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宋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多,分布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宋人文献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者,莫如大食国。”^[6]这些富商中,尤以阿曼苏哈尔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最大。阿曼人自古就以造船和航海闻名于世。早在公元8世纪中叶,阿曼著名航海家阿布·奥贝德·阿卜杜拉·卡塞姆(Abu Obide Abdullah Qasim)曾沿香料之道远航印度洋,抵达中国广州访问,成为有文字可查的最早访问中国的阿曼航海家。阿曼巴蒂那海岸上的苏哈尔港扼守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咽喉,海湾地区和东非沿岸国家的商贾基本上都是通过苏哈尔将其商品运往中国进行贸易的。因此,直到15世纪,苏哈尔港一直享有“中国的门户”之称。苏哈尔商人正是凭借这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对华贸易中独占鳌头。宋神宗在位年间,常驻广州的苏哈尔大富商辛押陀罗(Singyattolo),曾因其对开展阿曼和中国的“互市”贸易贡献巨大,而被宋神宗特授予“归德将军”封号,并赏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2],以资鼓励。

另一方面,宋人撰述的有关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及其风土人情的史书更多,记载也较前详细。例如,宋代进士出身的官吏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卷三《大食诸国》一书中便对大食诸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在元代,蒙古人仰仗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汉以来的中西交通大动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道”畅通无阻。中阿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互访盛极一时。当时的沿海城市泉州(时称刺桐港)对外贸易尤为发达,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胜数,并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之称。西方著名旅行家

唐朝同大食国的军事接触,共有5次。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2次:天宝十年怛逻斯之役;贞元十七年渡泸之役。规模比较小的有3次:开元三年之役;开元五年之役;乾元元年“寇广州”^[3](P10)。

在中阿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天宝十年(751)的怛逻斯之役。怛逻斯位于中亚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次战役是中阿关系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它是由于双方卷入当地民族和部落间的冲突所引起。此次战争因唐军中突厥人葛逻禄部临阵反叛,以及唐军统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轻敌和孤军深入,致使唐军大败,并造成大批唐兵被俘。但是,怛逻斯之役却对中阿的文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怛逻斯战役后,大批唐兵被掳往阿拉伯地区,他们之中有许多掌握造纸、绘画、金银器加工技术和工具、武器制造技术的能工巧匠。中国的造纸术随之传到了中、西亚,后又传至欧洲。中国的手工艺则传给了阿拉伯人。同时,中国出现了第一部用汉文记载有关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生活的游记性书籍。这便是唐代人杜环撰述的地理著作《经行记》¹。杜环是在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所俘的文人出身的中国军人,被俘后,他在大食国居留12年之久,其间游历了中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公元763年,杜环经海路自阿拉伯湾回到中国广州,随后撰写了《经行记》一书。该书以亲身体会和观感,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和戒律,以及穆斯林的社会生活等,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介绍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生活基本情况的文献。

中阿双方的诸多交往必然导致彼此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接触与联系。事实上,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也都是在相互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中求得发展的。来华的阿拉伯伊斯兰商贾在从事商贸活动和居留期间,他们所崇尚的伊斯兰信仰和伊斯兰文化也在中国社会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逐渐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换言之,阿拉伯穆斯林“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物质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际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又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扎根生长,……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4](P3)

¹ 杜环系《通典》作者杜佑(公元735-812年)的族子,所著《经行记》原书已佚,现存该书部分内容是杜佑在《通典》中引用时保存下来的,共计1511字。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将中国的泉州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视为世界两大海港。而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渊的两次远航也都是自泉州出发,航程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红海,所到之处包括埃及、摩洛哥、苏丹、索马里等。他撰写的《岛夷志略》是详细记录14世纪中国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在政治、经济、贸易、宗教和文化诸领域交往情况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元代时期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h)亦曾访问中国的泉州、广州和杭州等城市。在他撰写的游记中,也对这些城市的风貌、民情、中阿之间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以及中国的烧瓷技术和手工艺等作了详尽的描述。

进入明朝后,中国开始把大食国称为“阿刺毕”。明初100年是中阿之间海上交通的鼎盛时期,据《明史》记载,明朝来华使节约34次。明廷十分重视阿拉伯穆斯林来客,专门设立了四夷馆和回回司天监等。同时,明廷在明朝初期仍然注重发展国际贸易,实施“遣使四出招徕”政策,扩大中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进中国与海外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往来。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七下西洋的壮举正是在明初对外开放政策的氛围下实现的。

郑和自第三次(1409)远航,每次都必经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译霍尔木兹),然后西行至阿拉伯半岛,进而抵达东非海岸。在此期间,郑和到达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祖法尔(今阿曼的佐法尔)、阿丹(今也门的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实吉(今阿曼的马斯喀特)、刺撒(今也门的伊萨角)等。同时,郑和也是现有史料中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圣城麦加的朝拜者。后来,郑和第七次远航时,远洋船于1432年行至印度古里国,适逢有麦加使者来,船上太监洪保便选派通译等七人携缎匹、瓷器、麝香等随同使者从古里又乘船到了麦加。他们从麦加带回各种奇珍异宝和狮子、麒麟(长颈鹿)、鸵鸡等物,还绘制了麦加克尔白《天房图》。在朝拜麦加后,他们又西行数百里至默德那(今麦地那),并瞻仰了那里的穆罕默德陵墓。

此外,陪同郑和远航的一些随员后来撰写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其中包括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里槎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等。

郑和七下西洋结束后,东西方力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西方列强在15、16世纪迅速崛起,并加快对东方实施侵略扩张和进行海盗劫掠。面对强敌,明廷一改汉唐以来的开放政策,转而采取了“不务远略”的闭关海禁政策。因此,16世纪中叶后,中国商

船几乎绝迹于马六甲海峡以西,中阿之间的友好交往受到严重阻碍。

四、中阿交往对科技和文化的影响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非凡贡献。中阿交往为进一步促进双方乃至世界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是蚕桑丝绸的发源地,中国的养蚕技术在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陆续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铁器也是先传入伊朗安息王朝,继而又传入阿拉伯地区,并促进了阿拉伯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火药是在1230年传入阿拉伯的。后来,火药又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传给了欧洲人。阿拉伯的炼金术同样深受中国的影响,阿拉伯炼金术的祖师查比尔(Jabir ben al-Hayyan)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炼金术起源于中国和印度。阿拉伯炼金术士试图效法中国道家,通过炼丹来达到祛病延年之目的,因此,在他们的炼金术中,引进了中国的汞和铅、硃砂等矿物和药物^{[6](P140)}。阿拉伯炼金术对欧洲近代化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中国传统医学,如切脉、针灸和治疗药方等,则在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中逐渐被阿拉伯人所认同和接受,并被纳入伊本·西那所编的《医典》中。

中国古代文明对阿拉伯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的造纸术和瓷器。怛逻斯战役后,中国的造纸术在中亚和北非得到推广。后来,中国的造纸术又传入欧洲各国。纸的应用不仅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对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除了火药和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其他两项发明,即指南针和印刷术也是在中世纪通过伊斯兰文明陆续被引入欧洲的,并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7](P67)}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伴随丝绸之路和香料之道的开通,以精美雅致著称的中国瓷器被输往阿拉伯各地。据史料记载,埃及法蒂玛王朝时期,阿拉伯人仿制中国瓷器的技术已相当娴熟,仿制品包括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等,其式样和花纹酷似中国瓷的真品。中国瓷器为阿拉伯人的饮食用具增添了新的选择,同时中国瓷器还作为特殊装饰品被应用于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从而又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

阿拉伯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灿烂文化

同样对古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主要从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方面汲取了有益的养分。

元朝初年,穆斯林科学家扎马鲁丁(Jamal al Din)将阿拉伯的天文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天文学观测和天文仪器的发展。同时,扎马鲁丁还把阿拉伯绘制地图的方法介绍到中国,为元朝编撰全国地理图志《元一统志》作出了突出贡献。

阿拉伯数学,包括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知识,与阿拉伯天文学同时传入中国。天文学涉及数学计算和几何等知识,因此,数学是天文学的基础。穆斯林天文学家将先进的阿拉伯天文学引入中国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数学知识,促使元朝的数学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并产生了像郭守敬那样伟大的数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在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时间最长,延续360年之久,但郭守敬在推验《授时历》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精密计算,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在中国首先采用了弧三角法作为割圆术,而这一弧三角法据说就是由阿拉伯穆斯林传入中国的。又如,在元朝出现和流行的“土盘算法”,不仅可用于乘、除法,而且还可以用于平方、立方、开平方、开立方。据说这种计算方法原为印度算家所用,后流传至阿拉伯,阿拉伯穆斯林又将其带入中国。

在医药学方面,自阿拉伯医药学家伊本·西那(Ibn Sina)的著作《医典》在宋朝随商船传入中国后,有多部阿拉伯医药学书籍陆续被引进到中国。《元秘书监志》卷七所列“回回书籍”中,就有《忒必医经》13部。忒必,系阿拉伯语Tibb的音译,意为医学、医术或医经。这些医药学著作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来中国医药学的发展都起过有益的作用。例如,元代穆斯林译编的颇有影响的《回回药方》,其病理理论及学术思想,便源自阿拉伯医学体系。而且,它同伊本·西那的《医典》在体例、内容和安排方面有密切联系。中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

也收录了部分阿拉伯药物和治病方法。另一方面,阿拉伯医学还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和利用。元朝太医院曾设立专门研究和使用的阿拉伯医药的“广惠司”,并在京城和多伦分别开办了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与此同时,一些阿拉伯药材,如没药、硼砂、木香、阿芙蓉等也被应用于中国的医药学。特别是阿拉伯香药还导致中国药物剂型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汤剂为主体的中药,逐渐向丸、散、膏、丹等剂型发展,并最终使丸、散得以盛行。

总之,中阿关系源远流长,双方在历史上的交往是多领域和全方位的。同时,这种交往又以互动性和开放性为基本特征,在融汇与碰撞、冲突与整合中,彼此发现,互为动力,兼容并蓄,从而共同促使着各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扬光大,推动着双方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为近现代中阿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范晔.西域传[A].后汉书[C].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陈公元.中国阿曼友好关系小史[J].西亚非洲,1981,(5):.
- [3] 李兴华.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 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 [5] 张铁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友好关系[J].西亚非洲,1984,(2):.
- [6] 陈炎.海外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7]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8] 步履.汉唐时代的中西交通[J].西北大学学报,1980(2).

[责任编辑 刘欢]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States in History

WANG Tie zheng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earliest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can date back to the time of the ancient 'Silk Route'. During this long time, governmental exchanges and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were mutually promoted and a wide range of areas were involved. There were not only peaceful communications dominated by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ctivities, but also some violent touches in the form of conflicts and wars. All these exchanges propelled forward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both China and the Arabic World. These exchanges also made an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a; the Arab States; History; Cultural exchange